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唐诗选本研究/金生奎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

陈犀远. 苑. 陈犀远. 陈犀远

摇 I 明…摇 II 金…摇 III 唐诗—文学研究—中国—明代摇 IV 中国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0000 号

明代唐诗选本研究

金生奎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58 号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邮编 230026	印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电话 总编室 0551-2938631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发行部 0551-2938631	印张 10
网址 增刊 2009 年第 1 期	字数 20 千字
责任编辑 陈犀远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陈犀远. 苑. 陈犀远. 陈犀远 定价: 20.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摇摇录

绪摇论	(员)
第一节摇明前唐诗选本编选的历史过程	(圆)
第二节摇明代唐诗选本概说	(苑)
第三节摇相关的界定与说明	(员源)
第一章摇明代唐诗选本叙录	(圆)
第一节摇明前期唐诗选本叙录 (明洪武至成化年间)	(圆)
第二节摇明中期唐诗选本叙录 (明弘治至隆庆年间)	(猿)
第三节摇明后期唐诗选本叙录 (明万历至崇祯年间)	(缘)
第二章摇明代几种重要唐诗选本的刊刻与传播	(愿)
第一节摇高棅《唐诗品汇》编刊与传播考论	(愿)
第二节摇李攀龙唐诗选本编刊考订	(员)
第三节摇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的编刊与传播	(员缘)
第三章摇明代唐诗选本与明代社会	(圆)
第一节摇明代中期的士风、学风与唐诗选本的编刻	
——以杨慎唐诗选本及批评为例	(圆)
第二节摇商业因素对明后期唐诗选本编刻的推动	
——以《唐诗画谱》为例	(员)
第三节摇晚明社会文化背景与唐诗选本的编刻	
——以周珌《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为例	(员)

第四章摇明代唐诗选本与诗学批评	(页源
第一节摇明代宏观诗学流变与唐诗选本的编选	(页缘
第二节摇明代诗学辨体意识与唐诗选本的编选	(页缘
附录一	(页源
附录二	(页苑
附录三摇“踏花归去马蹄香”的著作权归谁?	(页源
参考书目	(页员
后摇记	(页苑

绪摇论

唐代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高峰期，更具体地说是一个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它为后世建立了内容博大、风格多样的诗歌范型。在唐代之后，唐诗的传播与接受形成了一个连绵不绝、牵涉广泛的诗学传承体系。其中，唐诗选本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一者唐诗选本是唐人别集之外唐诗传播的另一种主要形式，二者唐诗选本也是唐诗批评的重要手段。而唐诗选本发展到明代，在继承前代唐诗传播与接受历史的基础之上，结合了其时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与诗学批评环境，形成了专属于有明一代唐诗选本的特点与成就。

第一节 摇明前唐诗选本编选的历史过程

唐诗的编选与传刻早在唐代便已开始。在整个中国古代唐诗学的发展过程中，唐诗选本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四个历史阶段：初创期（唐五代）、发展期（宋金元）、兴盛期（明代）及集成期（清代）。明代唐诗选本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唐诗编选的各种成就与特性的形成，是建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在对明代唐诗选本进行研究之前，对明前唐诗编选与传播的历史进行简要的梳理十分必要。

总的来说，唐诗选本是随着唐诗创作的繁荣而出现的。从初唐到晚唐，与其时诗歌的发展进程紧密相联，唐诗选本的编纂也逐渐兴起，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成为唐诗选本发展史上的初创阶段。就唐人选唐诗而言，当代有学者已考及 员种，存目 缘种，^[1] 数量比较可观。流传至今，尚有十几种存世，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唐人选唐诗新编》一书辑录了《翰林学士集》、《珠英集》、《丹阳集》、《河岳英灵集》、《国秀集》、《篋中集》、《玉台后集》、《御览诗》、《中兴间气集》、《极玄集》、《又玄集》、《才调集》、《搜玉小集》等 员种。

这些唐人编选的唐诗选本，产生于唐代不同时期，其编选体例和选诗体现的诗学主张与当时的诗学理念相辅相成，反映了唐诗创作与理念从初唐末到晚唐的变化与发展。以所选诗歌的年代论，唐人编辑的唐诗选本既有历代合选，也有断代专选。大致来说，前期唐人选唐诗以历代合选为主。此时的唐诗选编和诗歌创作一样，还没有摆脱六朝以来诗歌习气的影响，唐诗自身的独特审美特征与艺术价值还没有获得充分体认。因此，人们在编选唐诗时往往是与前代诗歌合编在一处。而真正能充分反映唐诗特殊价值与诗学地位的是开元以后较多出现的、单选唐诗的断代诗选。这些诗选往往是编辑者对稍前或当下唐人诗歌创作的一种直解反映，体现了编者敏锐而独到的诗学洞察力，所选诗歌大都集中于一个时段或一部分人。比如，孙季良《正声集》、崔融《珠英学士集》等专选初唐人诗歌，其中《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2]《珠英学士集》“但纪朝士”。^[3]元结《篋中集》、殷璠《河岳英灵集》则专选盛唐人诗作，前者一共选入 苑人计 圆首诗作，以“淳古淡泊，绝去雕饰”^[4]为选诗标准，倡导“雅正”，是针对盛唐、中唐之际社会状况与诗歌创作情况而来的；后者分上、中、下三卷，选 圆人计 圆首诗作，以“风骨”、“兴象”相号召，非常准确地概括了盛唐诗歌的典型特征。

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选编了至德至大历间 14 位诗人，“但使体状风雅，理致清新，期观者易心，听者竦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1]指出了中唐前期诗歌风格的新变特征并给予肯定。到了中晚唐，随着唐诗的发展，唐诗特有的审美风貌与艺术特征逐渐清晰起来，唐诗选家也不再满足于仅仅以唐代某一时期或某些具体人群的作品为选，而是开始以一种通识的眼光对唐诗作全面的观照，通盘地体察唐诗的发展过程，把唐诗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对象来把握。比如，晚唐前期人顾陶曾花了很大心血^[2]编选《唐诗类选》10 卷。全书选初唐以来诗作 1500 余首，是当时卷帙最大的一部唐诗选，所收录的一些诗作成为后世学者校订异文的重要资料。^[3]而且此书不单以选诗数量取胜，还以识见卓异赢得后世称赞。顾陶之前的唐诗选，对李白、杜甫这两位唐诗代表的独特诗学地位并未能给予充分重视，像《河岳英灵集》不收杜诗，《中兴间气集》不收李诗，甚至有二家诗全不收的。顾陶不仅李、杜全选，且在自序中特地称扬李、杜道：“李、杜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并。”^[4]从整个唐诗选本历史看，顾陶可以说是第一个大力推重李白、杜甫的人。另外像唐末韦庄的《又玄集》、五代韦毅的《才调集》等都是通选四唐之诗的选本，在后世一直颇受注意。

另外从体例上看，以现存唐诗选本而言，很多都是以《文选》以来文学选本的常例来编排诗人诗作的。选本中按照诗人的时代先后排编作品，在选集正文之前一般都有选家自序，如此等等。唐人诗选中的这些自序非常重要，他们或是叙说编者的文学观，或是评点诗坛风尚，或是说明自己的编选标准，是诗选正文之外的另一种独特的唐诗批评方式，具有很珍贵的诗学批评价值。像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中提出的“兴象”、“风神”之说成了后世对唐诗风貌的标准定义。在继承传统之外，唐人编选唐诗在体例上也不乏创新之处，后世常见的选诗与评点相结合的方式便是唐人首创。如《河岳英灵集》，除了集前有序和集论各一篇，用以概括编选宗旨和诗歌发展源流之外，集中诗人名下都附有小传式的评语，概括诗人的艺术风貌，间或涉及诗人生平事迹、人品气节等。这些评语大都简洁传神，成为后世了解相关诗人的第一手资料。比如评李白，云：“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5]又评王维，云：“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成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6]又评常建诗作，云：“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7]这些精彩的评点，体现了选家对诗人的深刻理解及对其诗作精髓的准确把握。其后，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加以效仿，而选、评结合的选本体例便由

此成为唐以后唐诗选的基本样式。

另外，除了从时间、体例等角度之外，唐人编选唐诗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有的是从题材角度编辑诗选，有唱和集、家集、送别集、考试诗集等；有的是以不同诗学标准选编诗作，既有《篋中集》那样强调诗歌社会功能、以古雅为标准选诗的，也有《玉台后集》这样以宫体艳诗为选编对象的诗选；有的选诗，有的则是单单选诗中佳句……总而言之，唐人编选唐诗的丰富多彩，显示出唐代诗歌以及诗学思想极大的开放性。这些选本建立起来的诗选体例、标准以及诗学思想，为后世的唐诗选家所继承，并结合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具体社会文化状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对后世唐诗的编选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当然，由于此时还是处于初创时期，唐人编选唐诗的工作基本都是在唐诗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的，虽然能接触最原初的编选对象，对诗人、诗作有最新鲜的感受与认识，但是同时也缺少了文学批评所必需的距离，故而选家对唐诗的整体认识还不可能完整、准确、成熟，一些缺点与不足也在所难免，如一些重要诗选不能体现唐诗的多样风格，未能兼顾各种流派，还没有一部能完整概括唐诗风貌的选本，如此等等。

进入宋代以后，唐诗作为一种高妙的诗歌范型正式确立，并赢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因而，学习唐诗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诗歌创作风气，终宋一代，从宋初的西昆体、晚唐体、香山体到影响巨大的江西诗派，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宋人试图通过学唐来建立本朝诗歌康庄大道的努力与尝试。这种努力与尝试表现在唐诗的传播层面，就是大量唐诗别集、笺注的出现，某些重点作家作品的刊刻与笺注则尤其受到关注，出现了所谓“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盛况。与此同时，唐诗选本的编纂也受到重视，出现了许多影响很大的唐诗选本。据当代学者孙琴安先生《唐诗选本提要》考证，现已知的宋代唐诗选本将近四十种，而当时实际诞生的唐诗选本数量当远远大于此数。

宋代唐诗选本的大量出现，除了前面提到的诗学崇尚上的影响之外，也与当时具体的社会文化大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两宋时期，国家推行偃武修文、鼓励读书仕进的文化政策，学校教育发达，书院兴盛，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学术风气和诗歌创作风气，存在一个唐诗传播的大量受众群体。另外，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和改进，书籍的刊刻要远远方便于前代，唐诗选本在传播媒介上也因此具有了前人所没有的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唐诗的选编、刊刻自然也就获得了相当良好的扩展空间。在宋人的唐诗选本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专体诗选出现的频率大为增加，现存宋人唐诗选本的一半以上都是某一唐诗体裁的专选，如五言诗选、七言诗选、绝句选、律诗选等。其中

著名的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刘克庄的《唐五七言绝句》、赵蕃、韩淲《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赵孟奎《分门纂类唐诗选》、周弼《三体唐诗》等。在孙琴安先生《唐诗选本提要》一书著录的宋人唐诗选本中，仅绝句一体的专选就有九种，由此可见宋人对唐绝句的重视。对诗歌体式的明辨，也是学术活动的重要方面。宋人尚学，落实到诗歌层面，就是注重颇有学术意味的诗歌校订、笺注等工作。而专体唐诗选的集中出现，一方面便于学习，一方面也体现了诗学领域学术倾向性的加强，这种对诗歌体式的关注与推重直解启发了后来明代学者对诗歌辨体的重视。

宋代唐诗选本的另一个突出之处就是评点本在南宋时期的兴起。虽然在宋代之前的唐人选唐诗中也出现了一些评点，但此时的评点还属于不成熟形态的评点，或是出现于诗选正文前的序、论之中，或是与诗人小传掺杂在一起，未能与具体的诗歌文本紧密联系。而南宋中后期，为了满足参加科举考生的需要，以“取便科举”为主要编辑目的、带有详细评点文字的文章选本大量诞生，比较著名的有《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规范》等。^[1]受文章评点的影响，随文而行的诗歌评点也开始兴起，当时以评点著名的有谢枋得、刘辰翁等人。其中，刘辰翁“以全副精神，从事评点，逐渐摆脱科举，专以文学论工拙”，^[2]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评点大师。^[3]他批点过的唐诗选本或别集有《王孟诗评》、《韦孟全集》、《刘辰翁批点三唐人集》、《盛唐四名家集》、《李杜全集》、《唐百家诗选》等六种，在评点用语、评点手法与评点符号等方面对后代唐诗的评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总的来说，宋代唐诗选本的编著在内容、形式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尤其是选本作为学诗范本的意义得到很大加强，各种专体诗选就是当时指导学诗的范本。这种指导初学的目的，同时也直接推动了诗话、评点本的产生。宋代诗歌重学、重理，作为学习范本的唐诗选，其诗学色彩也因此更加明显、浓厚。选本中的诗话、评点等即是选家诗学思想的直接表达。由于宋诗在体式上继承了唐诗的律体，唐诗就成为宋人在追寻、效法前代诗歌时的主要选择对象。但是，面对唐诗的巅峰之势，宋代诗歌创作又必须努力开辟新的途径，从而确立自身在诗歌史上的独特面貌。因此，宋人在编选、评点唐诗的时候，如何学习唐诗、怎样在学习中寻求突破，就成为当时的一个很现实的理论问题。所以宋人对诗史的重视，对诗学问题的思考，也就显得非常突出。宋诗与唐诗的异质因素、宋人对诗学问题的深入思考等，都极大地丰富了作为文学批评方式之一的诗歌选本的内容，当时的唐诗选本也就成为具有浓厚诗学思辨意味的诗学批评形式，建立起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诗学价值取向、审美偏好，比如辨体意识的加强、对律体学习的重视等。

唐诗的选编到了元代后，进入了一个相对的低潮期。因为元蒙统治者对传统文化的疏隔，在大的文化政策上采取了十分不利于正统的诗文雅文学发展的方略，当时最为兴盛的是元杂剧等不怎么受上层政策影响的通俗文学，因而唐诗的选编在传播条件和受众数量上都远不及宋代。从数量上看，据《唐诗选本提要》一书的著录，今天可知的也就 50 种左右，明显比不上两宋时期，更远远不能和后来的明清二代相较。不过，在南宋文化气息影响还比较浓厚的元初以及传统诗文雅文学重新抬头的元代后期，唐诗的选编还是有相当成就的，对后世唐诗的选编以及某些唐诗批评理论的建立，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杨士弘的《唐音》和方回的《瀛奎律髓》。杨士弘的《唐音》在唐诗批评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此选共十五卷，分始音、正音、余响三个部分。第一卷为始音，仅录王、杨、卢、骆四家。卷二至卷十四为正音，以诗体编次；卷十五为余响，不以诗体编次。除了王、杨、卢、骆四家之外，杨士弘将所选唐诗进行分期：自王绩到张志和为唐初、盛唐诗，自皇甫冉至刘禹锡为中唐诗，自贾岛至韦庄为晚唐诗，李白、杜甫、韩愈三家因为世多全集，未加选录。杨士弘此选的重要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区分四唐，通过选诗来力图概括唐诗的大概演变趋势，体现了明确的诗史意识。在杨士弘之前，选家选唐诗往往不太重视初唐、盛唐、中唐以及晚唐的时代区分，即便是一些通选四唐的诗选，也很少明确地在选本中强调四唐诗歌的阶段特征，很少区分唐诗中正格与变格的差异。杨士弘以初唐、盛唐、中唐以及晚唐来区分唐诗，在明清两代成为主流的唐诗划分法。二是重盛唐而轻中、晚唐，申正黜变。从唐代的《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到金朝元好问的《唐诗鼓吹》，在杨士弘之前的许多代表性选本大都是略盛唐诗而主选中、晚唐诗；像选诗广泛的王安石《唐百家诗选》，除了高、岑、王、孟诸家之外，也是以晚唐人诗为多。杨氏在《唐音》中大力标举盛唐正格，体现了他对唐诗风貌的深刻理解，他的主张开启了有明一代崇尚盛唐诗歌的风气。方回的《瀛奎律髓》是元代另一部值得强调的唐诗选本。此选受宋代重视律体选诗风气的影响，专选五七言律诗，而且是唐宋诗合选。这种唐宋合选的形式，体现了生活于宋末元初的方回对唐、宋诗之间关系的一种认识。方回在诗选中提出了著名的“一祖三宗”说，认为作为宋诗主脉的江西诗派祖绍唐诗的代表人物杜甫。方回的这种判断，体现了他对宋诗源头的一种思考，即将宋诗的发展追源到唐诗内部，贯连唐宋，建立起宋诗、特别是江西诗派与唐诗之间的联系。另外，《瀛奎律髓》一书又将诗选与诗话相结合，进一步发展了唐诗选的编撰形式。

第二节 明代唐诗选本概述

唐诗选本的编撰发展到明代，出现了极其兴盛的局面。单从数量上看，据笔者统计，目前可知的明人编辑唐诗选本至少有 100 多部。这种局面的产生，除了书籍刊刻极度繁荣、学校教育发达等外在背景的刺激之外，明代诗歌创作流派众多、诗学纷争激烈等唐诗编选所直接依托的内在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从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看，诗歌演进到明代，古体诗、歌行、律诗、绝句，各种诗歌体式都已经极为完善。在题材方面，诗歌也已经深入到从自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难再有新的开拓。而且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到了明代，诗歌的各种风格、审美特性也已形成，明代诗歌很难再寻找到一个开创性的发展空间。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明代诗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丰厚的诗歌遗产面前，竭力探求如何确立本时代学习仿效的目标。

有明一代，诗歌流派繁多，诗学论争持续不断，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茶陵诗派、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这些诗歌流派或倡复古或尚趋新，或重形式格调或主情绪性灵，但是无论何种诗派、何种主张，他们所效法的对象都是唐诗。因为对于复古派来说，唐诗是向上追溯的起点；同时，诗歌的新体式又是在唐代产生并达到极盛的，故而趋新者也不能避免地以唐诗为楷模。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之下，明代唐诗选本非常繁荣，几乎所有的诗派都以选本的形式来阐扬自己的诗学主张，标立自己认为诗歌创作应该学习的样本，唐诗选本成为人们张扬己见、攻击异端的重要武器。这样，明代唐诗的选编、刊刻与明代的诗学论争产生紧密的关联，相互之间互为因果，相互刺激、生发，既促进了明代诗论的发达，也同时提高了唐诗编选的数量和诗学品质，加大了明代唐诗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产生了许多影响巨大的经典唐诗选本，其中某些选本不仅在明代广受好评，甚至到了清代中期仍然“盛行乡塾间”。^①

归纳起来看，明代唐诗选本的编辑与传播有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其一，在总体宗唐的大趋势中，对盛唐诗歌的重视与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明代之前，从唐、五代到宋、元，盛唐诗歌并未成为唐诗选家的关注中心，除了元后期的《唐音》外，很少有以盛唐诗歌为标榜的唐诗选本。而有明三百年间，在杨士弘《唐音》的直接启迪下，对盛唐诗歌的推崇成为诗学批评的主流。

这种推重，从时间上看，在明代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都有鲜明的

体现，有着一一条贯穿全明的线索。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首开明人诗宗盛唐的风气。此选共 16 卷，收诗 2800 余首。高棅详细探讨了唐代诗歌史的流变，并对自唐以来代表性唐诗选本的优劣进行了仔细地考察。在总结前人编选唐诗经验的基础上，尤其是借鉴了杨士弘《唐音》的相关看法后，高棅在总序中明确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同时在正文中，按诗体编排诗篇，每种诗体以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等九格进行分类。这样，标榜正、变的九格与区分四唐的分期相结合，其中最受高棅重视的正宗、大家、名家、羽翼四格全部由盛唐诗歌构成，标立盛唐诗歌的意图十分明显。《唐诗品汇》这样一部卷帙浩大、体系严密的选本自诞生之日起，注定了将成为明代诗坛推重盛唐诗歌的号角与旗帜。后来，前后七子倡导“诗必盛唐”，就明显地承高棅《唐诗品汇》的衣钵而来，在整个明代中后期，唐诗选家几乎是言必称《品汇》。作为后七子之一的李攀龙继起编辑了《古今诗删》，其中唐诗部分独立成一部《唐诗选》，更是大力倡导初、盛唐诗，并凭借李攀龙在文坛的领袖地位，获得了最广泛的社会认可，使得对盛唐诗歌的崇尚成为当时诗学的绝对主流。高棅的《唐诗品汇》、由《品汇》精选而来的《唐诗正声》，以及李攀龙《唐诗选》的各种笺注评点本都被反复刻印，历久不衰。而明后期唐诗选本代表作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虽然选诗宗旨与高棅、李攀龙不同，“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1]但以选取的诗人诗篇看，仍然是以盛唐为宗，16 卷唐诗中有 15 卷是盛唐诗歌。其他明后期比较著名的唐诗选本比如臧懋循的《唐诗所》、陆时雍的《唐诗镜》等，也都是以盛唐为尚的。

明人推重盛唐诗歌，从选本编排上体现的逻辑看，是这样一种思路：在整个诗歌史上，认为唐诗是最好的诗歌范型；在四唐诗歌中，盛唐诗是最典范的学习样本。也即是说，明人选本对盛唐诗歌的强调，着眼点是从大的诗歌史角度出发的。所以，在现在可知的 16 部明人唐诗选本中，单纯以盛唐诗歌为对象的选本并不多，除了尚冕的《盛唐遗音》、吴复的《盛唐诗选》、彭轸的《盛唐雅调》、张之象的《唐雅》、吴勉学的《盛唐汇诗》、臧懋循的《唐诗所》、程元初《盛唐风绪笺》、熊伯甘《初盛唐律诗选》及无名氏的《盛唐十二家诗》之外，绝大多数都还是通选四唐的选本。而明人对盛唐诗歌的推重除了序跋中的明确宣言之外，主要就体现为在通选一代的情况下对盛唐诗篇的加以特别的强调。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高棅与李攀龙的唐诗选为例。为了更直观地展示，将相关数据列表如下：

《唐诗品汇》、《唐诗正声》、《古今诗删》与《全唐诗》四唐选诗比例比照表^{〔四〕}

名摇称	初唐	盛唐	中唐	晚唐	其他	合计
全唐诗	源	源	源	源	源	源
唐诗品汇	源	源	源	源	源	源
唐诗正声	源	源	源	源	源	源
古今诗删	源	源	源	源	源	源

由上表可以看出，盛唐诗歌在《全唐诗》中大概只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强，但在《唐诗品汇》中高棅选择的盛唐诗歌占到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左右，精选而成的《唐诗正声》则达到了一半，到李攀龙的《古今诗删》更是占全部唐诗的五分之三还多，比较之下，对盛唐诗歌的推重显而易见。明人编选唐诗选本时对盛唐的强调，大体上都是这样进行的，即在四唐诗歌通选的情况下，通过扩大盛唐诗歌在全书中占据的比例来彰显崇尚盛唐的意图。

在唐诗选家大力推崇盛唐诗歌的努力之下，在明代形成了明确的“诗必盛唐”诗学号召，盛唐诗歌作为最高诗歌典范的认识由此得以最终确立，并在后代成为一种近乎常识的诗学判断。这其中，高棅以下的明代唐诗选家居功甚伟。

当然，在宗法盛唐的主张成为主流意见的大背景中，明代唐诗选家并没有完全忽视中晚唐诗歌。除了那些主导性的、推崇盛唐的诗选如《唐诗品汇》、《唐诗选》、《唐诗归》等都收录了中晚唐诗歌之外，明代后期，作为对推崇盛唐诗风的一种补充或反动，也有部分唐诗选家编刻了一些专选中晚唐诗歌的选本，比如张应文的《中晚唐诗选》、朱之蕃的《晚唐十二家诗》、姜重生的《唐中晚名家诗集》、刘云份的《中晚唐诗》、龚贤的《中晚唐诗纪》等。但是与强调初盛唐诗的选本相比较，中晚唐诗选的数量极其有限，而且也没有能够在当时诗学批评领域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因此，只能算是宗尚盛唐主流之外的明人唐诗选本别调。

其二，从明代唐诗选本编刻的时间以及相对应的选本数量上看，明人的唐诗编刻活动有明显的阶段性。

从时间分布上讲，明中后期唐诗选本的编选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刊刻活动都远远超过明代前期，有着显然的阶段性特征。以笔者考订的^{〔四〕}明人唐诗选本而言，属于明前期的是^{〔五〕}源部，属于中期的是^{〔六〕}源部，属于后期的是^{〔七〕}源部。^{〔八〕}再举能间接反映唐诗编选活跃程度的选本刊刻情况来看，以明代经典唐诗选本高棅的《唐诗品汇》为例，在有明一代，该选本曾先后^{〔九〕}

次刻印，属于前期的只有两次，属于中后期的则有 员 次之多。^[183]

明代唐诗选本的编刻之所以出现前期萧条、中晚期繁荣这样特别明显的阶段性差异，是有必然性的因素在其中的。以笔者拙见，至少有三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前期唐诗选本编刻活动的低迷。

首先与上层推行的科考制度改革有相当的关联。明代以前，诗歌与科举功名在大部分时候是有着比较紧密关联的，科举试诗比较常见。到了朱明立国，“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184]统治者从推行教化、控制天下读书人思想，从而更好地统治社会的角度出发，将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进一步教条化，科考内容从灵活多样一变为单单从《四书》出题，答题形式上也僵化地规定为八股。明代科举考试的这种八股化，使得传统的诗赋取士被取消，追求功名的学子只需要埋首于范围狭窄的《四书》以及朱熹的注解中即可金榜题名，诗歌作为读书人晋身途径的资格被剥夺，明代举子不必像唐宋士人那样把诗歌视为发展个人前程上的“必须”，诗歌的这种“实用性”功能被取消。整个社会中，就个人对诗歌的选择而言，除了个人兴趣偏好，以及中上层士人功名成就以后的应酬需要之外，诗歌退出了很多读书人的视野，未发达的士子若谈论起诗歌一类八股文之外的内容，常常会被看作是一种不务正业的行为，所以在明前期的后半段，以致出现了读书人不知道杜甫、苏轼为谁的大笑话。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使得一贯作为诗歌典范的唐代诗歌相应地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可能的读者群、受众群，而唐诗的编选相对于诗赋取士的唐宋时代，也就相应地失去了一部分外在需求的刺激，作为学诗样本、取便科考层面的唐诗选本也便因之失去了依托。

其次，明早期，上层大力推行程朱理学，牢笼了读书人的思想，贫化了读书人的文学审美能力，限制了士人对诗歌功能的认知宽度。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即多次诏命：“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朱棣接着又是命令“儒臣辑《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全书》，颁布天下。”^[185]上层大力宣扬、推行的这种国家思想文化政策，和八股取士的制度相结合，非常迅速、彻底地使程朱理学变成了有明一代文化知识界的绝对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文以载道、注重教化的儒家功利文学观成为最普遍的认识，“文者，道之所寓”；^[186]“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犹不文也”；^[187]“夫诗小用之则小，大用之则大，可以动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鸟兽。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褒贬，雪月风花之品题，一而已矣”。^[188]类似的表述在明前期的人文文

集中屡见不鲜。结果就导致在诗歌创作上，“今百年，士之达而在上者，肆为瓊奇盛丽之词，昔莫不歌咏帝载，以鸣国家之盛；其居山林间者，亦皆呶吟王化，有忧深思远之风，不徒留连光景而已。”^[1]所以，在此时诗坛上流行的是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风和以陈献章、庄昶为主的性理诗派：台阁诗是点缀升平、歌咏帝德，性理诗派以宋代理学家邵雍《伊川击壤集》为模本，以理趣、教化为诗歌第一要务。在这样一种诗歌认识之下，明前期诗学批评界对唐诗的见解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2]对诗圣杜甫的接受角度与理学家诗人邵雍等量齐观，风华绝代的唐诗被明前期人从一道极其逼仄的狭缝中审视，唐诗的编刻、传播在理念层面上就首先受到很大的压抑，唐诗选本的稀少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再次，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使得私人刻书业没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唐诗选本的传播在媒介上受到较大的抑制。书籍的传播离不开具体的媒介，唐诗选本的兴旺发展自然离不开大的书籍刊刻背景。有明一代的刻书业也和其他朝代一样，基本上可以分成官刻和私刻两种类型。明代前期官刻书还是比较发达的，“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3]除了中央政府层面的南北国子监、六部、翰林院等各个部门之外，地方各省的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分巡道、各府、州、县及其儒学等地方行政部門，各地书院，各亲王藩府、各郡王府等，都参与了主持或出资刻印书籍的活动。但是，明前期这种由各级国家机构主持或是出公帑刊刻的书籍，在意识形态上更是容易受到当时官方文化政策与理念的影响，据《古今书刻》等有关资料的记载看，明前期的官刻书除了偶尔刊刻《唐音》等少数前代唐诗选本外，绝大部分的书籍刊刻活动都是与儒家典籍紧密相关的，像唐诗这样与理学、八股科考等毫无关系的内容根本就不在当时官方出版机构的视野之内。与此同时，在刻书内容与性质上作为官刻书重要补充力量的私家刻书在明代前期却并没有能够承担弥补官刻之缺失的重任。所谓私刻，主要指的是私宅或坊肆的刻书。朱元璋建国之初，虽然也曾下令减免刻书者的捐税，但是在当时整体上重视农业生产、严厉限制工商业的经济政策下，书籍刊刻这样的手工行业仍然受到极大的限制，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明前期在南方一向书业繁盛的江南、福建等地区几乎没有什么私刻活动。这样，官刻忽视，私刻力量极其有限，明前期唐诗选本的编刻在传播媒介上受到很大的限制。三点结合起来，明前期唐诗选本既无内在强大的需求刺激，又缺少良好的外在传播条件，萧条、衰落局面的出现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但是，与前期状况不同，明代中后期唐诗选本的编刻环境大为改善。首

先是对唐诗的认识与判断发生变化。成化以后,随着王阳明的心学兴起,前期程朱理学大行其道、思想文化界铁板一块的局面轰然坍塌,虽然官方哲学在表面上仍然高举理学大旗,但是在读书人阶层中,“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10]在思想认识层面以狭隘眼光看待唐诗的不正常状态得以改变,反映到诗学批评领域,台阁体诗风和性理诗派失去市场,自前期之末李东阳起,标榜格调之说开始盛行,由此对唐诗的重视大为提高,到嘉靖初年前七子提出了“诗必盛唐”的经典口号,对唐诗的尊奉成为绝对的主流。比如,在明代唐诗学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唐诗品汇》,虽然卷帙浩大,但在弘治到嘉靖初期的短短三四十年之中就至少刊刻了缘次之多,而之前百年《唐诗品汇》自诞生之日起,至多刊刻过两次。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唐诗出版事件,表明了自明中期开始,人们对唐诗的一般性态度发生了与前期截然不同的变化。在认识层面对唐诗尤其是盛唐诗歌的崇尚,有力地推动了唐诗的编选与刊刻活动,唐诗选本在明代迎来了它第一轮编刻的高潮。到了万历以后,随着统治者社会控制力的进一步降低,社会文化与诗学认识更是趋于多样,唐诗选本编刻活动在理念层面的空间更是大大扩展,编刻唐诗选成为当时十分热烈的文化现象,像李攀龙《唐诗选》这样的经典选本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竟然刊刻了将近 100 次,有众多的名家闻人对其进行评点。其次,与这种理念层面的变化相对应的,是唐诗选本编刻的外在条件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私刻力量的崛起保证了唐诗选本物质传播层面的需求,并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唐诗选本的编刻活动。明中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商业传统浓厚的南方地区在此时开始重新迎来工商业繁盛的局面。在其中,书籍刊刻业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方面。嘉靖年间的唐顺之等人谈到当时的刻书情况,说:“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歿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又云:“近时之稿板,以祖龙手段施之,则南山柴炭必贱。”^[11]这两段话虽然是从批评的极度来谈论当时书籍的滥刻现象,但也同时间接地反映了从明中期开始私家刻书的繁盛,而这种状况对唐诗选本的编刻自然是大为有利的,并与当时的诗歌创作和诗学风尚相结合,使得唐诗选的编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局面,以至于像汇集众家评点、笺释的《唐诗选脉会通评林》,遍收全唐、卷数上千的《唐音统签》等这样带有集大成性质的巨型唐诗选本得以出现。商业利益与诗学风尚的完美结合,奠定了明中后期唐诗选本大繁荣的基本架构。

其三,与明代唐诗选本在时间上的这种阶段性差异相对应的,是有明代唐诗选本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性,即明代唐诗选本的编刻主要集中在江

南地区，其他地方只占有极少的比例。在下文第一章著录的猿猿种明代唐诗选本中，有五分之四左右的选本是由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江西东北部等传统上被称为江南的这一片地区编刻的。虽然在福建、山东、湖北等地区出现了《唐诗品汇》、《唐诗选》、《唐诗归》等明代唐诗选本的代表作，但在整体数量上仍然不能避免江南以外地区的弱势局面，而且这些江南以外地区诞生的代表性唐诗选本的主要刊刻活动往往是在江南地区完成的，比如像《唐诗品汇》、《唐诗选》在明中后期的大多数版本都是刻印于江南一带。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大体不外以下几点：

一则江南地区自宋代以后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区，工商业发达。虽然明代前期受到国家经济政策的有意识地抑制——江南地区赋税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重农思想对江南工商业传统的敌视等等，但到了明中叶之后，因为生产力的积蓄和恢复，以及帝国统治者限制力量的松懈，经济重新迎来繁荣。这时的江南地区，不仅农业上因为先天的地理优势而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地，而且也是全国工商业最繁盛之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丝绸织造行业主要就集中在江南一带。发达的经济条件使得包括唐诗选本在内的文化消费有了一个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的水平和能力。二则是江南地区从明代之前也是全国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区，在明代统治者大力推行学校教育的有利背景下，明代江南地区的文化更是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举例而言，以有明代读书人考中状元的比例看，大多数都是江南地区的士子，尤其以作为江南文化代表的苏州一带最为突出。因此，江南地区拥有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读书人数量，这种状况对于唐诗选本的编刻而言，便意味着江南地区唐诗选本的受众群体最起码在数量上就高于其他地方。三则是江南一带从明中期开始，是全国刻书业的中心地区，尤其是私刻发达。据周弘祖《古今书刻》所记，明代中期官刻书南直隶（安徽、江苏）有源源种，与此同时北直隶则只有愿愿种。明后期大学问家胡应麟谈及当时全国刻书情况，曾说：“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闽閩也，临安也。闽、楚、滇、黔，则余间得其梓。秦、晋、川、洛，则余时友其人。旁谭阅历，大概非四方比矣。”又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1]由此可见当时刻书业江南一带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有苏州、南京、杭州著名书籍集散地。而当代学者的研究，也和古人的意见一致：“明版本，若就地方而言，则苏、浙、皖、闽为刊刻中心也。”^[2]这一地区也诞生了当时最著名的一些出版家，像苏州的毛晋、湖州的凌氏、无锡的闵氏等都是其中的翘楚，他们

刊刻了包括各种唐诗选本在内的大量图书。另外，能反映当时江南地区书业繁盛局面的就是当时的藏书情况。明代中后期的著名藏书家几乎都是江南一代的人，举例而言，有叶盛、范钦、茅坤、祁承、毛晋、黄虞稷等。其中像叶盛“藏书之富，甲于海内”，毛晋“汲古阁”藏书大约^[1]愿愿册。因此，这种巨大的书籍刊刻能力，使得江南地区具有唐诗选本编刻所需要的最佳外在媒介条件，这一点与前面两点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促成了江南地区的唐诗选本数量远大于同时其他地区的局面。

第三节 摇相关的界定与说明

前面两节对明前唐诗选本以及明代唐诗选本的基本情况做了简单介绍，以作为全书展开的一个背景。本节将做与论题有关的一些补充性说明，即与“明代唐诗选本”这一概念有关的界定工作，关于本书章节框架的说明，以及目前学界与“明代唐诗选本”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的介绍等。

首先是“明代唐诗选本”这一概念的界定与说明。关于选本，从古以来已有许多解说，但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严密、并为学界公认的概念界定。^[2]不过，大体来说，选本是一种总集。那么总集的功能何在？清人总结认为，“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3]可见总集的功用一则是网罗众作，二则是荟萃菁华。作为总集之一的选本，其功能则更偏向于区别优劣，表达编者的某种文学理念，也就是文学批评。所以，选本之名重在一个“选”字，与“逢诗辄取”^[4]一类的总集还是有区别的。因而对于本书研究的对象“明代唐诗选本”而言，就是指从^[5]员建元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到^[6]员万历年清军入关这一个时间跨度之间的所有能体现出“选”意的唐诗总集。

作出这个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之后，还有三个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一下。

一是易代之际的不能确定确切编选年代的唐诗选本问题，即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个时间段内编辑时间不明的唐诗选本究竟归于哪一朝代的问题。本书在处理这一问题的准则是：大体上是产生于元末明初之间，但不能确切考证是编选于明代的唐诗选本，不纳入本书考察范围；大体上编刻于明末清初之间，而没有明确证据能够证明是清初编订成书的唐诗选本，则一律算作是明代唐诗选本。这样处理的考虑是：唐诗选本是一种文学批评方式，从诗